



## 乾祐二十年《弥勒上生经御制发愿文》 的夏汉对勘研究

聂鸿音

在黑水城的出土文献中，西夏仁宗皇帝御制的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发愿文》是最早为世人所知的西夏本土作品。这篇短文原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版本，内容基本相同。其中的汉文本最初由伊凤阁在1911年移录公布，<sup>①</sup>其后又经中国学者多次转载发表，但原始文献的照片则迟至1996年才得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。<sup>②</sup>伊凤阁的录文没有标点，沙畹在对录文的评论中为之加上了标点并附上了比较详细的注释，<sup>③</sup>只不过有个别标点和注释在今天看来并非全然无可指摘。

西夏文本的原件和汉文本一起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，编号 ИИВ. № 941。也许是因为与汉文本内容相同的缘故，这个西夏文本长期以来并没能在学术界引起关注，其原件和录文也始终未获刊布，只是在十年前由西田龙雄译成了日文。<sup>④</sup>不过遗憾的是，西田先生当年所见仅为 ИИВ. № 617 和另一个编号不明的残本，里面恰好佚失了发愿文的结尾部分。本文将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世纪末在俄罗斯拍摄的照片对完整的发愿文进行译释，目的是为西夏语言文学研究补充一份新资料。

西夏文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》于11世纪下半叶由夏惠宗皇帝共其母梁太后转译自刘宋沮渠京声汉译本，<sup>⑤</sup>约一个世纪后又经仁宗皇帝校订。据克恰诺夫介绍，<sup>⑥</sup>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

① А. И. Иванов, “Страница изъ исторіи Си-ся”, *Известі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іи Наукъ*, VI серия, томъ V (1911), с. 831-836, 中译文题作《西夏史一页》，见孙伯君编：《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》（一），民族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61~164页。以下征引伊凤阁意见均出此文。

②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：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2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47~48页。

③ *T'oung Pao*, vol. 12 (1911), pp. 441-446, 原作者 Ed. Chavannes。中译文题作《评伊凤阁〈西夏史一页〉》，见孙伯君编《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》（一），民族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65~168页。以下征引沙畹意见均出此文。

④ 参看西田龙雄为克恰诺夫《西夏文佛典目录》（Е. И. Кычанов, *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*, Киото: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, 1999）写的序言。

⑤ 与通行汉文本（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14册，第418~420页）相比，西夏文本在卷尾多出了“弥勒真言”“生内官真言”“弥勒尊佛真心咒”“弥勒佛名号”“三皈依”等内容，篇幅占经折装的4折，所以西田龙雄对西夏翻译所据的原本是否沮渠京声本存有疑义。

⑥ Е. И. Кычанов, *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*, Киото: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, 1999, с. 389-396.



菩萨上生经》者，义统玄机，道明至理。<sup>①</sup>先启优波离之发问，后彰阿逸多之前因；具阐上生之善缘，广说兜率之胜境。<sup>②</sup>十方天众，愿生此中。若行十善持八斋，及守五戒修六事，命终时如壮士之臂伸屈，随愿力即投于天。宝莲之中得生，弥勒亲自来接；未低头顷，<sup>③</sup>闻妙法音。发无上不退坚固心，超九十亿劫生死罪。闻名号，则不堕黑暗边地聚中；若归依，则入成道受记中。佛言未来修此众生，其得弥勒为之摄受。见佛之奥理功德，故命镂版印经。谨于乾祐己酉二十年九月十五日，延请宗律国师、净戒国师、大乘玄密国师、禅师、法师、僧众等，请就大度民寺内，具设求修往生兜率内宫弥勒广大法会，烧施道场作广大供养，<sup>④</sup>奉无量施食，并念诵佛名咒语。读番、西番、汉藏经及大乘经典，说法作大乘忏悔，散施番、汉《观弥勒菩萨上生经》十万卷，并汉《金刚般若》<sup>⑤</sup>《普贤行愿品》<sup>⑥</sup>《观音普门品》等各五万卷，<sup>⑦</sup>暨作斋僧、放生、济贫、喂囚诸般法事，<sup>⑧</sup>凡七昼七夜。以此功德力，伏愿一祖四宗，主坐上宫宝座；<sup>⑨</sup>崇考皇妣，上生兜率莲台。帝祚无穷尽，圣宫长吉祥，不谷黄发寿永，四海长享升平。福德同乎三轮体空，本理当契一真言绝。谨愿。

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皇帝谨施。

在乾祐二十年（1189）九月十五日由仁宗皇帝亲自发起的这次大法会上，多达 10 万卷的西夏文本和汉文本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》是同时刊印散施的。此前西夏境内已有《弥勒上生经》的夏汉两种文本流传，这一点自无疑义，但专为此次法会施经而撰写的发愿文却给我们留下了些许疑问——文章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两个文本的产生次序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知道当年究竟是先写了西夏语发愿文再译成汉语，还是先写了汉语发愿文再译成西夏语的，而且也不知道夏汉两篇发愿文的作者是不是同一个人。凭感觉说，西夏文在国内受重视的程度应该在汉文之上，而这篇发愿文也应该是先用西夏文写就，然后再译成汉文的，然而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。

我们看到，发愿文的汉文本尽管写得刻板而稍逊文采，但其基本体裁却是标准的骈文，相比之下，西夏文本却在有些地方违背了应有的骈俪节奏，令人读来偶有佶屈聱牙之感。最突出的例子是汉文本的“闻名号，则不堕黑暗边地之聚；若归依，则必预成道受记之中”一联，在西夏本作“𐽄𐽅𐽆𐽇𐽋𐽍𐽎𐽏𐽐𐽈𐽉𐽊𐽌𐽑𐽒𐽓𐽔𐽕𐽖𐽗𐽘𐽙𐽚𐽛𐽜𐽝𐽞𐽟𐽠𐽡𐽢𐽣𐽤𐽥𐽦𐽧𐽨𐽩𐽪𐽫𐽬𐽭𐽮𐽯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”（闻名号，则不堕黑暗边地聚中；若归依，则入

① 明（𐽄𐽅），汉文本作“存”，“道存至理”犹言“教法中存有绝对真理”。西夏文意为“以教法昭示绝对真理”，似不切。

② 兜率，西夏文作“知足”，为梵文别译。东晋僧伽提婆译《三法度论》卷下注：“兜率哆天，晋曰知足天也。”参看《大正藏》第 25 册第 27 页上栏。西夏学界此前多将“兜率天”（𐽄𐽅𐽆𐽇）据字面译作“足知皇”，误。

③ 未低头顷（𐽄𐽅𐽆𐽇𐽈𐽉），汉文本作“未举头顷”，“低”与“举”意义相悖。疑为西夏语、汉语此处表达手法不同。

④ 烧施道场（𐽄𐽅𐽆𐽇𐽋𐽈𐽉𐽊），汉文本作“烧结坛”，沙畹引马鸣《大庄严论经》“犹为火所烧，忧结喻如火”为证，失当。按西夏“烧施”即佛教仪轨中的“护摩”，习称“放焰口”。

⑤ 金刚般若（𐽄𐽅𐽆𐽇𐽋𐽈𐽉𐽊），汉文本作“金刚经”，均为姚秦鸠摩罗什译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不同省称。

⑥ 普贤行愿品（𐽄𐽅𐽆𐽇𐽋𐽍𐽎𐽏𐽈𐽉𐽊𐽌），汉文本作“普贤行愿经”，均为唐般若译《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》的不同省称。

⑦ 观音普门品（𐽄𐽅𐽆𐽇𐽋𐽍𐽎𐽏𐽈𐽉𐽊𐽌），汉文本作“观音经”，均为姚秦鸠摩罗什译《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的不同省称。

⑧ 喂囚（𐽄𐽅𐽆𐽇），汉文本作“设囚”，伊凤阁指为“赦囚”之误，沙畹同。今依西夏本，“设囚”当可解为“为囚设饭”，则汉文本不误。按“赦囚”为官家敕令，非佛家法事所关。夏乾祐十五年（1184）《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御制发愿文》正作“喂囚徒”，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编：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第 3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56 页。

⑨ 上宫（𐽄𐽅𐽆𐽇），夏译似不切，当从汉文本作“内宫”，呼应上文“求生兜率内宫”。

成道受记中), 逐字译来是“名号闻, 则黑暗地边聚中不堕; 若归依, 则道成记受中入”, 其中不但上下句的字数没能形成对应, 而且还重复使用了“𪛗”(中)字,<sup>①</sup>这些都可视作骈体文写作的大忌。事实上在西夏的文学作品中虽然没有“骈文”一体, 但西夏人头脑中却有着很清楚的“对仗”观念, 西夏民间流传的谚语和格言大都是严格遵循对仗原则而创作的。<sup>②</sup>由此不难想到, 如果西夏人当初真的是要仿照中原的骈俪文体来进行原始创作, 那么就应该不会在对仗方面犯下如此明显的错误。这样我们就可以说, 就像其他大多数夏汉对译的文章一样, 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》后面的这篇发愿文也是先用汉文写就, 然后再译成西夏文的。

至于西夏文发愿文的译者, 我觉得很可能与汉文发愿文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, 这主要是考虑到西夏文的结尾部分与汉文本在词句上相差较大。另外就文中提到的三部佛经而言, 汉文本作“金刚经、普贤行愿经、观音经”, 而西夏本作“金刚般若、普贤行愿品、观音普门品”, 这应该是出自不同人对相同佛经的不同省称习惯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)

---

① 在汉语中, 除了“之”“乎”之类个别虚字外, 其他字不允许在骈文的同一联中重复出现。西夏字在这一联里出现了两个“𪛗”(中)字, 其补救办法其实很简单, 那就是把第一个“𪛗”字换成“𪛗”(内)。

② 关于西夏谚语和格言的原文和汉译, 参看陈炳应:《西夏谚语》, 山西人民出版社, 1993年。